

## 抗战时期孩子剧团的政治宣传

付冬生

**摘要:**抗战时期,在中共抗日民族统一战线旗帜的领导下,广大少年儿童积极投入到抗日救亡运动的洪流之中。他们以无比的勇敢和热情在民族危难的关头尽了少年儿童抗日救国的责任,发出了时代的光芒,成为全民族抗战的一支重要力量。作为民族一分子的少年儿童“天下兴亡,匹夫有责”的爱国情怀不仅鼓舞着成人,对全民族的神圣抗战起到了巨大的激励作用,还对中国革命的历史进程产生了积极影响。其中,被誉为“中国儿童界三大明星”的孩子剧团肩负革命、宣传和教育使命于一身,不仅为抗战政治宣传做出重要贡献,也有力促进了当时儿童戏剧活动的开展,对战时陪都重庆及全国戏剧的繁荣起到一定的助推作用。孩子剧团灵活多样的宣传样态,丰富多元的表现内容具有很强的时代性和现实性,不仅让其成为抗日战争中一支独特的生力军,还是中共开展革命宣传及全民族抗战的一个不可或缺的组成部分。孩子剧团的抗战宣传在今天看来仍有一定的启示和借鉴意义。

**关键词:**抗战时期;孩子剧团;政治宣传

**中图分类号:**F30 **文献标志码:**A **文章编号:**2096-5443(2021)04-0120-09

**项目基金:**国家社会科学基金重大招标项目(16ZDA191);重庆市社会科学规划项目(2016YBWX075);四川省教育厅人文社会科学项目(GY2018B02);重庆市教育委员会人文社会科学研究基地项目(19JD027)

据抗战三周年的统计,连民间剧团计算在内,全国各战场的新演剧队伍,约有三万以上的戏剧兵之多。<sup>[1]</sup>新安旅行团、广州儿童剧团、劳动童子军、儿童工作团、报童近卫军、少年铁血队、少共国际师等都是声名远播的少年儿童抗日团体。其中,被誉为“中国儿童界三大明星(新安旅行团、政治部孩子剧团、私立育才学校)”<sup>[2]</sup>之一的孩子剧团影响最大。“八一三事变”后,在地下党组织的领导下,“吴新稼等十二个孩子在难民收容所里结合了起来,决定在难民所里开始讲演,贴壁报,演剧等宣传工作。”<sup>[3]</sup>1937年9月3日,上海第一个抗日儿童戏剧团体——孩子剧团“从什么也没有和什么也不怕的情况下产生出来”<sup>[4]</sup>,一个半月内“孩子剧团前后演出的次数超过四十次以上”<sup>[5]</sup>。孩子剧团以文艺为斗争武器,通过戏剧演出、歌咏、演讲、街头宣传、标语、慰问信、参加军民联合公演等宣传形式,激发少年儿童和人民群众的抗战热情,成效明显,不仅为抗战政治宣传做出贡献,而且成为抗日救亡和民族解放不可或缺的儿童武装力量。孩子剧团的优异表现引起了周恩来、邓颖超、郭沫若、冯玉祥、茅盾、老舍、田汉、陶行知、冯乃超、丁玲和冼星海等革命家和文艺工作者的高度关注。周恩来用“救国、革命、创造”<sup>[6]</sup>六字勉励;郭沫若评价其“尽可以成为一部抗战的侧面史”<sup>[7]</sup>;茅盾称赞其是“抗战的血泊中产生的一朵奇花”<sup>[8]</sup>。

遗憾的是,当前抗战文学研究主要集中在文学作品、文学思潮和文学论争等方面,对以孩子剧团为代表的少年儿童抗战文艺团体缺乏关注,对其政治、历史和文化价值认识不足,未能给予客观评价,且遮蔽了抗战文学的历史面貌,这也成为抗战文学研究的一个盲点。鉴于此,本文以孩子剧团的政治宣传为研究切点,重点考察1937年至1942年孩子剧团政治宣传的基础、独特的宣传方式及意义,探讨其在抗战时期的历史文化价值。这对20世纪中国儿童文艺团体的抗战文艺研究,应当有着

一定的参考价值。

孩子剧团的成立具有一定的偶然性,但它是一个兼有抗战宣传队伍共性和自身个性的团体。与其他队伍一样,无论是文艺演出,还是政治宣传,它都以动员民众和掀起抗日救亡热潮为宗旨。不同的是,孩子剧团的主体是孩子,因他们年龄小,演出形式灵活多样,极易得到百姓的喜欢,政治宣传效果极好。孩子剧团的政治宣传是建立在一定的经济、文化和思想基础之上。其中经济基础是剧团开展政治宣传的前提,文化基础是保障,思想基础则是关键。

抗战时期,众多的少年儿童抗战团体多为自发组织,属民间自行管辖。其中,影响较大和成就卓越的团体才会被政府或相关机构收编。随着孩子剧团在上海、武汉的声誉与日俱增,加上周恩来、郭沫若的努力推荐,1938年4月,辛汉文带着陈诚签名的“由沪来汉之孩子剧团,着由本部收编”<sup>[9]</sup>的批条,将团员带到武汉县华林的国民政府军事委员会政治部第三厅驻地,此举标志孩子剧团被三厅收编。三厅是“国统区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一个战斗堡垒”,主要负责“民众之组织与宣传”<sup>[10]</sup>工作。孩子剧团被收编后的首要任务是服从抗战宣传需要,最大地发挥自身作用。1938年10月,孩子剧团转战湖南。因长沙儿童剧团抗战宣传反响强烈,郭沫若向军委会政治部请求收编:“职厅所属孩子剧团工作素称努力”“唯自武汉迁移以来,沿途所收纳之小朋友已有10人以上。前月疏散人口时,复有长沙儿童剧团10余人。”郭沫若拟将“长沙儿童剧团收编,与孩子剧团合并”,两团合并后“唯仍用孩子剧团之名,分为二队,将其年长者为第二队,年幼者为第二队”<sup>[11]</sup>。郭沫若在报告中对剧团收编后的命名、分队和经费等问题说明。当天政治部副部长张厉生批示:“照办”。<sup>[11]</sup>孩子剧团和长沙儿童剧团合并后宣传规模、实力和影响力进一步扩大。新孩子剧团有编制58人,男团员37人,女团员21人。军委会拨付每人每月生活费15元,工作费若干和开办费几百元。1941年2月11日,军委会政治部组织戏剧指导委员会文件指出:“拟设立部立戏剧学院,以孩子剧团并入该院(班)受训,由田汉负责主持,每月经费7000元。除孩子剧团原有经费3478元(三十年度新预算)全部移作该院(班)经费外,其余3522元由本部文化团体不足费项下补足。”<sup>[11]</sup>有了经费保障,孩子剧团从此摆脱了生存压力,不再为吃喝发愁,能够全身心投入抗战政治宣传工作中去。孩子剧团也是有官方记载纳入军委会正式编制的为数不多的少年儿童抗战文艺团体之一。我们知道经济基础决定上层建筑,作为上层建筑中意识形态的政治宣传也必然受制于经济基础。一旦离开经济基础,政治宣传就成了无本之木、无源之水。抗战期间,许多艺术团体的活动经费为民间捐助和自行筹措,如无经费保障,这些团体开展演出活动将困难重重。个别有影响力的文艺团体也是发展到一定规模才被收编,如新安旅行团被军委会政治部批准成为特约群众团体,保留组织工作上的独立性,接受军委会的指导和任务分配。孩子剧团成立半年就被收编,成为有组织编制和津贴供给的抗战文艺团体,这是中国抗战史上的一个先例。用他们自己的话说:“从此以后,我们的工作是一天天的得到顺利的开展同保障”<sup>[4]</sup>。孩子剧团的成功收编一方面与周恩来、郭沫若等人的帮助密不可分;另一方面与剧团自身的拼搏奋斗紧密有关。有了三厅的经费支持,孩子剧团的政治宣传如鱼得水。可以说经济基础是孩子剧团开展政治宣传的重要前提。

战时意识形态的政治宣传离不开文艺方针政策的指导,而文艺工作者素质的高低直接决定政治宣传水平的优劣。孩子剧团被收编后,郭沫若敏锐地意识到团员普遍都是适龄入学儿童且求知欲望强烈。为提升政治宣传效果,必须提高团员思想素质和文化水平。考虑到孩子年龄大小、文化水平高低不一,指导员陈乃昌“把全团的同志分为甲、乙、丙三班,采取‘会的教人,不会的跟人学’这一原则,努力学习。”<sup>[12]</sup>作为一支文艺宣传队伍,孩子剧团还必须具备戏剧、音乐、舞蹈和美术等专业知识。除邀请常任侠、曹荻秋担任语文、英语教师外,陈乃昌还聘请田汉、石凌鹤等讲授戏剧理论知识;冼星海、张曙和李广才等教授钢琴、作曲和乐理知识;李可染、刘明凡等开设美术课。郭沫若也多次

给孩子剧团上课。据陈模、周令章回忆：“沫若先生和三厅党的地下组织就安排了一些大先生，给我们讲戏剧、音乐知识，也讲时事。以后又派了老党员蔡家桂同志，担任我们的指导员，经常给我们上政治课，还发展了一批党员。”<sup>[13]</sup>孩子剧团的学习工作齐头并进，在转移途中，常常会看见这些十岁左右的孩子在船上、车上和驻地用废弃的烂纸写字、算算术。他们十几个人合用六七只钢笔和一瓶墨水，两人共用一本练习簿。就连郭沫若也说：“他们始终是自己管理自己的，一面工作，一面学习，丝毫不肯懈怠。”<sup>[7]</sup>文化艺术等课程的设置为孩子剧团的政治宣传奠定了扎实的文化基础，还成为团员自身文化素养提升的一条有效途径，也为其今后的职业选择打下了基础。

孩子剧团是在上海国难教育社地下党书记王洞若和临青学校教师吴新稼的帮助下建立的。上海临青学校受陶行知教育思想影响甚深，吴新稼是陶行知的学生。孩子剧团的成立说明两个事实：第一，它是在党的领导下成立的抗日儿童团体；第二，它成立与国难教育社和陶行知有着千丝万缕的联系。1936年国难教育社成立时有20多个早期的孩子剧团团员加入，团长吴新稼被选为理事。因此渊源，孩子剧团初期受到陶行知教育思想的影响就不难理解。抗战期间，陶行知提出“生活即教育、社会即学校、教学做合一”等三大教育主张，他把学校教育总结为四个方面：集体生活、文化钥匙、特殊的学习和自动力之培养。他主张“解放孩子的头脑、双手、眼睛、嘴巴，让孩子做‘小主人’‘在做中学’‘在劳力上劳心’”<sup>[14]</sup>。在陶行知教育思想哺育下，孩子剧团积极参加公益劳动和文艺宣传活动，这在陈模的回忆中得到证实：“我们剧团信奉陶行知先生生活教育理论，实行‘教学做合一’，这一条真灵。”<sup>[15]</sup>为了更好地管理团队，剧团制定了《孩子剧团团歌》《孩子剧团章程》和《孩子剧团公约》，对团员的生活、学习、纪律和考勤等科学管理。由此看出，孩子剧团不是一个无组织、无纪律和松散的队伍。相反，却是一支作息规律，有着明确分工、考勤管理及宣传宗旨明确的文艺团体。孩子剧团自我约束、自我管理和自我学习的制度得益于陶行知的生活教育思想。陶行知曾说：“生活教育者的学校是炸不散的”<sup>[16]</sup>。“炸不散”是指学校采取生活教育的方式，将教育融入生活，这样学校是不会倒闭和炸烂的。孩子剧团不仅是一所“炸不散”的学校，还是一只流动的宣传队，其政治宣传处处体现陶行知的教育思想。

## 二

孩子剧团历时5年的政治宣传是一次漫长而艰苦的远征，深受沿途群众的欢迎。抗战语境下，孩子剧团的政治宣传常异于成人社团。如在宣传内容上渗透着中共政治思想；在宣传形式上灵活生动、孩子气足；在宣传手段上国际国内并重等。毋庸讳言，显性儿童视角和隐性中共思想叠合是孩子剧团最独特的宣传方式。

全面抗战爆发后，国民政府的宣传管控异常严格。1938年1月至1941年6月“被查禁的书刊就多达961种”<sup>[17]</sup>。1939年，国民政府秘密颁布《限制异党活动办法》《异党问题处理办法》等文件，规定“共党如办有报章、杂志、书店或印刷所等，均应依法办理立案登记等手续”“报章杂志如刊载有共党色彩之非法文字，亦应同予取缔”<sup>[18]</sup>。在日趋恶劣的政治环境下，中共开展宣传工作异常艰难，只有另辟蹊径。中共认为少年儿童是一支能改造现实中国的革命力量。孩子剧团抵达武汉后，中共审时度势、顺应形势，有意识地运用三厅的政治合法性完成收编工作。在三厅领导下，中共地下党组织还利用孩子天真无邪和善于隐藏等特点，将意识形态与孩子特性完美融合，有组织、有目的将政治宣传思想向孩子剧团内部渗透拓展。中共将政治形态与孩子剧团契合，把抽象的政治宣传概念幻化为儿童话语和表现形式，有效地凸显了其政治宣传的艺术性。孩子剧团在面对文化层次低、政治觉悟不高的普通群众时，充分考虑儿童演员的特点，巧妙地融入“抗日救亡、团结抗战”等思想，把显性儿童视角和隐性中共思想叠合，有效地传播了中共的政治文化和方针政策，不仅易感染民众和被民众接受，还成为中共开展革命宣传的重要组成部分。可以说，在大后方错综复杂的环境里，中共通过孩子剧团向民众介绍抗战形势，宣传意识形态及文化政策，从而探索出一条夹缝中政治宣传的新路径。



此外,在中共的指导下孩子剧团还成立了党支部。面对特殊而严酷的政治环境,时任长江局领导的周恩来特别重视党建工作,坚持“把加强党建作为抗战政治宣传的关键所在”<sup>[19]</sup>。1938年4月,周恩来指示长江局“孩子剧团也可以发展党员”<sup>[15]</sup>。1938年5月,在孩子剧团的秘密组织下,许立明、陈模、张宗元、徐祥仙、张浣清、张莺、罗真理加入中国共产党。加上原有的2名党员,剧团此时共有9名党员。在三厅地下党组织和郭沫若的关怀下,孩子剧团成立了党支部,团长吴新稼任书记。1938年11月党支部改组,蔡家桂任书记,吴新稼、林犁田任支委。党支部成立后非常重视党团员的培训工作,常邀请周恩来、郭沫若讲党课,不定期举办时事讨论和辩论会,剧团还设立小图书馆购买了进步书报。剧团常组织时事政治和抗战形势学习,邀请支部书记和党员上党课。孩子剧团追求进步、向往革命,“他们斗争目标很明确,就是接受中国共产党的领导,进行抗日救国。”<sup>[20]</sup>事实证明这9名党员以身作则、率先垂范,经受住各种考验,有很强的组织力、战斗力和号召力,他们用人格魅力去感染其他团员,确实起到先锋模范作用。值得注意的是,孩子剧团生死攸关之际,都是在党组织的帮助下化险为夷,这与王若洞、蔡家桂、吴新稼和三厅党支部书记冯乃超的关怀分不开。健全的党组织为孩子剧团政治宣传提供了有力的组织保证,经过中共政治思想渗透和改造的孩子剧团日渐成为其政治宣传的有力阵地。

孩子剧团还善于借助他人“喉舌”开展国际宣传。抗战期间国民政府尤为重视外宣工作,积极争取国际舆论的同情,广泛利用各类媒体展开国际宣传。1938年武汉各大媒体报道孩子剧团事迹后,引起国外媒体关注。随后,苏联、英国、美国和加拿大等16个国家的儿童团体先后给孩子剧团寄来200余封书信。郭沫若认为这是宣传抗日和争取国际同情的良机,他指派专人负责此项工作。在他的指导下,孩子剧团按照来信的内容和写信人年龄、性别等安排恰当的人员和对方通信并解答问题。“他们还和十几个国家的少年儿童通信联络,介绍中国的抗战情况,并收到国外来信200多封。”<sup>[21]</sup>这些书信寄往国外后产生了很好的宣传效果,国外少年对中国儿童的生存状况和抗战情况有了更多了解。在苏联建国20周年之际,孩子剧团给斯大林写信致敬并请求支援中国抗战,这封信在《救亡日报》上发表。后来,孩子剧团还给法国巴黎发电报支援反轰炸大会。1941年,孩子剧团还在《中苏文化》发表《致苏联人民书》来“祝中苏联合万岁的敬礼”<sup>[22]</sup>。孩子剧团的国际宣传意义非同寻常:一是动员海外广大少年儿童支援中国抗战;二是向国际社会揭露日本侵略者的暴行,争取在国际上获得同情和援助。孩子剧团也是较早与国外少年儿童团体建立联系,向国际社会积极正面宣传中国抗战的少儿抗战文艺团体。国际宣传成为孩子剧团开展政治宣传的一种特别有效的方式。

为加强中苏两国文化交流,争取当时唯一的社会主义国家——苏联的政治军事援助,1940年12月28日,中苏文化协会在重庆举办苏联驻华音乐广播活动,孩子剧团和育才学校应邀参加。育才学校陶行知校长出席活动后写下:“听孩子剧团唱《红缨枪》与育才唱《中国友人歌》。与孩子团握手致贺。”<sup>[23]</sup>第二天,歌声通过国际广播电台传到苏联。当天有两个少年团体受邀出席苏联驻华音乐广播活动,孩子剧团为其中之一,可见其在大后方的影响。1939年11月,孩子剧团参加为苏联专家举办的“纪念十月革命二十二周年活动”。团员们仅有一双黑跑鞋,无鞋演出。郭沫若得知情况后把剧团总务强明叫去,说:“他们那些人做官当老爷,从来不顾惜你们,你们还给他们争什么面子?”强明一时还没听明白,郭先生接着说:“全体团员都穿草鞋参加晚会,坍他们的台,捅他们一下!”<sup>[24]</sup>后来,团员果真穿着草鞋参加演出。演出后第三天,政治部总务厅将鞋袜费拨付。看得出,这种特殊形式的国际演出不仅是一种计策,更是一种斗争。抗战期间,孩子剧团借势用力通过更具公信力的他人“喉舌”,将“那些与现代民族国家相关的观念和思想”“通过传媒得以播散”<sup>[25]</sup>,宣传演出效果令人耳目一新。通过苏联驻华音乐广播等活动,孩子剧团的国际影响力进一步提升。

周恩来说,“儿童是社会力量的一部分,是抗日战争的一支小生力军”,要通过“戏剧、音乐和各种社会活动,把广大少年儿童团结组织起来”。<sup>[26]</sup>孩子剧团成为大后方少年儿童抗日团体的领导核心不是一开始就形成,而是在抗战实践活动中逐渐形成的。孩子剧团内部设有“一般工作部”,主要工

作是发动、团结和组织少年儿童壮大抗日力量,另一项主要任务是负责学校的儿童组织工作。孩子剧团将政治宣传引入学校,顺势将学校的儿童发动起来,不仅密切了抗日团体和学校的联系,而且使学校成为儿童抗日的根据地和桥头堡。除此外,为团结一切抗日力量,吸收更多的儿童团体和中小學生加入抗日救亡运动中,孩子剧团还利用“抗日儿童团体星期座谈会”来扩大政治宣传工作。“为了‘保卫大上海’集中全上海小朋友力量起见”,孩子剧团邀集了“十七个儿童团体,组织了‘上海市儿童星期座谈会’,每星期开会一次”。<sup>[4]</sup>这表明孩子剧团成立之初就意识到联合少儿团体共同抗日的重要性,剧团也极力在组织少儿抗战宣传中发挥领导作用。孩子剧团转移武汉石灰窑后“曾发动两千多小学生开了一个联欢会,把救亡的种子播送到这两千多个胸腔里去”<sup>[27]</sup>。随后,剧团建立“武汉市抗日儿童团体星期座谈会”,号召广大儿童团体参加三厅主持的抗日活动。在重庆,孩子剧团走访当地小学帮助建立抗日宣传队,与儿童农村宣传队、儿童演剧队、平儿院儿童战时服务团等合作建立“抗日儿童团体星期座谈会”,定期开会协调抗日宣传的行动计划、讲座安排和日常公演等事宜,每周还出版一期《重庆市儿童星期座谈会通讯》。这些工作对推动抗战宣传的制度化、常态化发展产生了积极影响。实践证明,“抗日儿童团体星期座谈会”是“孩子剧团在国统区开展抗战儿童工作的一个重要的组织形式,对推动大后方抗日儿童工作起了良好的作用”。<sup>[15]</sup>郭沫若多次参加“抗日儿童团体星期座谈会”,据陈模回忆:“星期讲座,第一讲就是郭沫若,听讲者700多人。他对国内外形势精辟的分析,出自肺腑的抗战激情,引起全场青少年多次暴风雨般的掌声。”<sup>[24]</sup>1939年3月20日,《新华日报》报道:“昨日请郭沫若先生讲‘二期抗战中小朋友怎样做工作。’并请赵启海先生教歌。”<sup>[28]</sup>借助“抗日儿童团体星期座谈会”这一平台,孩子剧团壮大了少儿抗日文艺团体的宣传力量。可以说“抗日儿童团体星期座谈会”是发动儿童联合抗日的一种好形式,它对培养少儿抗战意识和组织抗战宣传活动意义非凡。孩子剧团还对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建立起到了促进作用,以孩子剧团为核心的各儿童团体密切协作,有条不紊地开展抗日救亡的政治宣传工作,孩子剧团“也成了‘小鬼’的核心了”<sup>[29]</sup>。

在向大后方转移的途中,孩子剧团宣传爱国思想,组织其他儿童团体参加联合演出,政治宣传工作井然有序。1938年2月11日茅盾给孩子剧团题词:“谁对于民族前途抱悲观的,请看看这一队冲开了敌人的炮火的勇敢、天真、活泼的未来的中国主人!”<sup>[30]</sup>1938年11月,陶行知创办的生活教育社在广西开会。会上,郭沫若高度赞扬孩子剧团离家别母、舍生忘死,积极投入革命洪流的精神,他的讲话给孩子剧团及其他儿童抗日组织增添了无穷的力量。孩子剧团与新安旅行团、广西实验小学等商定每周召开一次座谈会,专门协商联合演出事宜。因前期准备充分,孩子剧团在桂林的联合会演空前成功。1941年4月4日,孩子剧团在重庆牵头组织“四四”儿童节庆祝大会,冯玉祥、郭沫若和陶行知等参会。另外,孩子剧团联络十多个儿童团体和小学开展抗战儿童戏剧演出和演讲比赛,还在重庆中山公园举办儿童歌咏比赛等。活动中孩子剧团都充当了领导者和组织者的角色,其组织力、凝聚力和影响力得到充分展现。孩子剧团还曾联系国内170余个儿童团体,试图把广大少年儿童团体组织起来开展政治宣传。孩子剧团领导核心的形成有着历史必然性:一是大后方环境的特殊性决定了少年儿童团体必须依靠成熟、坚强的领导核心;二是孩子剧团的先天优势和后天努力适应了这一客观要求,这种内外因的叠加促成其领导核心的确立。可以说,孩子剧团的领导核心地位在抗战初期已形成,在桂林时期逐渐强化,在陪都重庆时期得以明确。

1941年6月中央宣传部宣传工作提纲明确指出:“报纸、刊物、书籍是党的宣传鼓动工作最锐利的武器,党应当充分的善于利用这些武器。”“办报,办刊物,出书籍应当成为党的宣传鼓动工作中的最重要的任务。”<sup>[31]</sup>于是,孩子剧团把报纸等现代传播媒介当作政治宣传的主要载体。在武汉的孩子剧团因抗战宣传影响大,媒体争相报道。为鼓舞全民族抗战斗志,扩大宣传,剧团编辑出版《孩子剧团——从上海到武汉》一书。据《武汉文史资料》记载:“汉口大陆出版社还搜集了《新华日报》上刊载的文章和其他一些文章和题字、图片等编成一本书出版,书名是《孩子剧团——从上海到武汉》,

郭沫若同志为该书题了字。”<sup>[9]</sup>之后,剧团还编辑《儿童副刊》《孩子剧团成立两周年纪念特刊》,创办《抗战儿童》杂志。1938年8月孩子剧团来到湖南衡阳,进步文人孙伏园在此主办《通俗日报》,在孙的要求下孩子剧团负责编辑《儿童副刊》。《儿童副刊》占《通俗日报》的四分之一版面,每周出版一次,后“因离开衡山而停刊”<sup>[15]</sup>。1939年9月3日孩子剧团成立两周年,“团里除搞纪念活动外,让我编一本《孩子剧团成立两周年纪念特刊》”<sup>[15]</sup>。1940年春孩子剧团还创办《抗战儿童》杂志,陈模、吴克强先后担任主编,郭沫若题写刊名。因审稿及财力困难等原因,《抗战儿童》度日维艰,后与《儿童月刊》杂志合并勉强支撑到1943年冬,共出版7期。《抗战儿童》自觉担负起政治宣传的重任,对其他儿童刊物起到示范作用。孩子剧团借助报纸等媒介向读者宣传意识形态、抗战观念等,不仅有效传播了中共方针政策,而且宣传了自我。报纸、刊物和书籍等现代科技生成的传播媒介与革命意识的有效结合,具有传播渠道快和范围广等优势,这也给孩子剧团的政治宣传提供了便利。“传媒由于自身的宣传、鼓动、沟通作用,在一定程度上影响着人们的思想观念和社会舆论。”“它会被各种政治力量大力加以控制,用以宣传各自的思想,影响与发动群众,所以它与革命进程相伴随。”<sup>[32]</sup>孩子剧团创造性地将传统的宣传方式与现代传播技术结合,借助报纸刊物和书籍等媒介反映抗战,既宣传了革命者的政治意图,还推动受众的接受认知和理解进度,也使其宣传阵地和影响力进一步扩大。

### 三

孩子剧团的政治宣传塑造了一种全新的民众抗战动员模式。自成立以来,孩子剧团主要开展了三方面的工作:一事宣传工作;二是儿童工作;三是慰劳工作。其中,宣传工作居于首位。1939春到1940年夏,孩子剧团分两次奔赴川东、川西、川南和川北地区开展政治宣传,规模之大历史绝有。孩子剧团的政治宣传有两个优势:一是团员年龄小,演出投入,其苦难经历容易得到底层民众的同情;二是孩子剧团每到一处,第一时间联系当地少年儿童和人民群众,发动其加入抗日救亡运动中来,发挥当地百姓的主观能动性。可以说,孩子剧团的政治宣传是一次史无前例的全民动员——尤其是鼓动孩子参与抗战的过程,它塑造了一种全新的民众抗战动员模式。抗战期间,儿童是联系社会、学校和家庭的一个有效衔接点,还是对民众百姓与普通家庭展开抗战宣传的有效中介。在中共的指导下,孩子剧团在政治宣传活动中植入“抗日救亡”“民族大义”及“家庭社会”等观念,让底层民众与国家、抗战产生关联,吸引广大孩子参加抗战并辐射影响整个家庭或家族,最终达到动员民众支持和参战的目的。值得肯定的是,孩子剧团表演式、参与式的政治宣传有很强的艺术张力,其即刻传播效应明显,在无形之中强化和传播了抗战的主流文化,这不仅与日后国家动员尤其是中共的宣传动员模式不谋而合,而且还契合了民众固有的家国意识、善恶是非等观念,从而激发其抗日救亡的内心情感。“三分军事,七分政治,宣传重于作战”<sup>[33]</sup>。孩子剧团坚持“吾辈艺术工作者的全部努力,以广大抗战军民为对象”<sup>[34]</sup>的信条,主要利用戏剧武器并辅助歌咏、标语等容易被百姓接受的文艺形式实施宣传,受到群众和官兵的欢迎。有个东北军的长官看了孩子剧团的演出感叹道:“你们两三天的工作,比我们几个月的成绩还好!”<sup>[35]</sup>据统计,1937年9月到1942年9月,孩子剧团途经苏、皖、豫、鄂、湘、桂、黔、川、渝等9省(市)57个县市,行程两万余里,演出戏剧30多部,抗战歌曲80多首,演出500场次,约45万余人观看过其演出。<sup>[21]</sup>

孩子剧团的政治宣传还促进了大后方抗战戏剧运动的发展。戏剧是战斗的武器,是有利的教育工具,为民众乐于接受,更是适合大众的演出形式。戏剧宣传通俗易懂,能激发观众的情绪,产生共鸣。它不仅支配群众的闲暇生活,还成为官方向民众宣传抗日救亡的有效手段之一,也是大后方抗战文艺宣传的一种极佳形式,深受百姓喜爱。孩子剧团敏锐地意识到:“戏剧在抗战中是一个很有力量的武器,宣传与教育民众最好的工具。”“我们的同志差不多都是喜欢演剧。”<sup>[4]</sup>于是,剧团想方设法用戏剧服务抗战、宣传抗战,开创了戏剧宣传的新模式。1941到1944年,重庆连续举办四届“雾季公演”,242台戏剧轮番上演。其中,孩子剧团参与《乐园进行曲》《猴儿大王》两剧演出反响热烈。



1941年3月石凌鹤创作,郭沫若定名的话剧《乐园进行曲》在重庆国泰大剧院上演。该剧以孩子剧团的斗争经历为素材,意在揭露国统区儿童教养院的黑暗生活以及团员勇于抗战的社会现实,这也是中国戏剧史上第一部大型儿童话剧。1941年3月27日,郭沫若在《新蜀报》发文肯定:“这是他们在重庆开始第一次的大规模的公演,而所演的《乐园进行曲》,事实上就是以他们作为脚本而写出来的戏剧。现在却由他们自己把他们的生活搬上了舞台,真真是所谓‘现身说法’,我相信是一定会收到莫大的成功的。”希望这些“永远的孩子,把我们中国造成地上的乐园”<sup>[36]</sup>。1942年12月,孩子剧团参加石凌鹤、张莺改编的话剧《猴儿大王》的演出大获成功。《乐园进行曲》《猴儿大王》批判了国民党实施投降、倒退和分裂的政策,揭露了汉奸独裁者密谋投降和制造分裂的丑恶面目,反映了群众坚持抗战和争取民主自由的强烈意愿。此外,孩子剧团还独立创作和演出《帮助咱们的游击队》《把孩子怎么办》《最后的胜利是我们的》等儿童剧。孩子剧团还把法国作家都德小说《最后一课》改编为戏剧等。孩子剧团利用戏剧宣传抗战文化的同时,还将主流思想渗透到民众的意识中。可以说,其戏剧创作和演出扩大了抗战政治宣传的资源 and 影响。赵清阁曾说:“戏剧就是宣传与教育的文化工具。”<sup>[37]</sup>这表明戏剧除了带给观众娱乐功效外,本身还有一种宣传和教育的作用。在中共的指导下,孩子剧团以“雾季公演”为契机,利用“孩子”和“戏剧”相契合易被成人接受和媒体关注等优势在大后方演出,极大地激发了民众的抗日情绪。孩子剧团的声誉也迅速地传播到国外,产生了极强的宣传效果。事实表明,孩子剧团在国统区的政治宣传卓有成效,其声势浩大的戏剧演出为抗战宣传贡献突出,这对战时重庆戏剧演出的空前繁荣及全国儿童戏剧创作、儿童戏剧理论的繁荣起到一定的推动作用,还为抗战大后方戏剧运动的蓬勃发展及重庆在抗战大后方戏剧史上的地位奠定了基础,也有力地推动当时全国戏剧运动的深入开展。孩子剧团参与《乐园进行曲》《猴儿大王》的演出,标志着其戏剧艺术活动开始迈向大型舞台剧演出的新阶段,还为大后方的戏剧演出拥有更大的发展空间争取了条件。事实证明,在丰富大后方抗战文化的多样性方面,孩子剧团做出了一定的贡献,其戏剧演出也是抗战戏剧不可或缺的组成部分。

孩子剧团的政治宣传成为抗战文艺宣传的重要组成部分。“政治与抗战的关系是非常密切的”<sup>[38]</sup>。全面抗战爆发后,在“文艺为抗战服务”思想的引导下,作为抗战洪流中一支优秀的少年儿童团体——孩子剧团以文艺为武器,针对少年儿童身心特点,发起了团结少年儿童、坚持抗战、反对投降等主流意识形态的政治宣传,在一定程度上唤醒了民众的民族意识和国家意识,动员和鼓舞了广大少年儿童及人民群众抗日斗争的热情。孩子剧团在战火中历经千锤百炼,用他们稚嫩的双肩扛起民族的重任,以出色的表演去宣传抗日救亡的真理,起到成人剧团无法替代的传播作用和艺术效果,他们的演出无论是在内容还是形式上为抗日战争的胜利涂上浓墨重彩的一笔,在中国革命戏剧史、少年运动史上写下了光彩的一页,也成为中共抗战文艺宣传的一个重要的组成部分。实践证明,孩子剧团及其渗透在国统区的政治宣传是一件极具战斗力的武器,对持久抗战的最终胜利起到了军事斗争无法替代的积极作用。孩子剧团也是中国抗战史上行程远、宣传广的一个抗日救亡少年儿童团体,他们用实际行动感召和激励了四万万不愿做亡国奴的同胞,也成为其他少年儿童抗战团体学习的榜样。

#### 参考文献:

- [1] 阳翰笙. 国统区进步的戏剧电影运动//林志浩,李葆琰. 中国新文艺大系:1937—1949 评论集. 北京:中国文联出版社,1998:974.
- [2] 胡晓风. 孩子剧团在教育思想上给人们的启示//四川省青运史研究会重庆分会,共青团重庆市委青运史研究室编. 重庆青运史研究资料孩子剧团史料专辑,1986:3-4.
- [3] 刘巍. 孩子剧团的问访. 抗战戏剧,1938,1:6-7.
- [4] 强云秋,傅承谟. 两年来的孩子剧团. 剧场艺术,1940,2:4.

- [5] 介绍孩子剧团. 战时教育, 1938, 2: 1.
- [6] 慧琳. 孩子剧团欢迎会上. 新华日报, 1938-02-10(4).
- [7] 郭沫若. 洪波曲. 天津: 百花文艺出版社, 1979: 40; 41.
- [8] 茅盾. 记“孩子剧团”. 少年先锋, 1938, 1: 1.
- [9] 郑自来, 吴莆生. 活跃在武汉的孩子剧团. 武汉文史资料, 2015: 8-9.
- [10] 阳翰笙. 第三厅——国统区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一个战斗堡垒. 新文学史料, 1980, 4.
- [11] 袁佳红, 王志昆, 曾妍. 中国战时首都档案文献 战时文化, 2017: 319; 320; 329.
- [12] 高少清. 孩子剧团的学习. 战时教育, 1940, 5: 20.
- [13] 陈模, 周令章. 郭老和我们在一起. 孩子剧团. 成都: 四川少年儿童出版社, 1981: 45.
- [14] 付冬生, 范金艳. 陶行知与“孩子剧团”. 重庆师范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 2017, 5.
- [15] 陈模. 在实践中增长才干//奇花更艳——孩子剧团成立六十周年纪念文集. 纪念孩子剧团成立 60 周年筹备组编印, 1997: 42-43; 42-43; 67; 68; 68.
- [16] 陶行知. 生活教育目前的任务. 战时教育, 1939, 3: 10.
- [17] 张静庐. 中国现代出版史料丙编. 北京: 中华书局, 1956: 173.
- [18] 重庆市政协文史资料研究委员会, 中共重庆市委党校, 红岩革命纪念馆编. 战时期国共合作纪实(上). 重庆: 重庆出版社, 1992: 662.
- [19] 黎余. 南方局时期的周恩来如何抓党建. 红岩春秋, 2017, 1.
- [20] 蔡馥生. 在革命烘炉中茁壮成长//孩子剧团. 成都: 四川少年儿童出版社, 1981: 18.
- [21] 李桂杰. 孩子剧团: 童心依旧. 人民日报, 1997-08-13(10).
- [22] 孩子剧团. 致苏联人民书. 中苏文化, 1941, 8: 1.
- [23] 陶行知. 陶行知全集(第 10 卷). 成都: 四川教育出版社, 1991: 1111.
- [24] 陈模. 郭沫若与孩子剧团. 红岩春秋, 2002, 6.
- [25] 孟繁华. 传媒与社会主义文化领导权//金元浦. 文化研究: 理论与实践. 开封: 河南大学出版社, 2004: 233.
- [26] 罗立韵. 孩子剧团发动、组织少年儿童工作//孩子剧团史料汇编——在战火纷飞的年代. 孩子剧团史料编辑委员会编, 1989: 466.
- [27] 毓伦. 孩子剧团从石灰窑归来. 妇女生活, 1938, 5: 10.
- [28] 本市简讯. 新华日报, 1939-03-20(30).
- [29] 卡蒙. 在内地的上海儿童——“孩子剧团”的伟绩. 妇女文献, 1939, 2.
- [30] 陈模. 他的心是向着孩子的——缅怀敬爱的沈老//孩子剧团史料汇编——在战火纷飞的年代. 孩子剧团史料编辑委员会编, 1996: 542.
- [31] 中共中央文献研究室, 中央档案馆编. 中共中央宣传部关于党的宣传鼓动工作提纲//建党以来重要文献选编(一九二一——一九四九)第 18 册. 北京: 中共中央文献研究室中央档案馆编, 2011: 429.
- [32] 石磊. 大众传媒通论. 成都: 四川师范大学出版社, 2009: 69.
- [33] 熊佛西. 五年来的戏剧. 熊佛西戏剧文集(下册). 上海: 上海文艺出版社, 2000: 881.
- [34] 蓝海. 中国抗战文艺史. 济南: 山东文艺出版社, 1984: 34.
- [35] 潘高峰, 谭力. 抗日宣传战中的一朵奇花. 新民晚报, 2018-06-19(3).
- [36] 郭沫若. 向着乐园前进. 新蜀报, 1941-03-27(3).
- [37] 赵清阁. 战时戏剧的功能. 抗战戏剧概论. 上海: 上海杂志公司, 1939: 65.
- [38] 袁博. 抗战初期第三党人的政治主张——以《抗战行动》为中心的考察. 重庆交通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 2016, 3.



## Political Propaganda of Children's Theatre Troupe During the Anti-Japanese War

*Fu Dongsheng* (ChongQing Normal University)

**Abstract:** During the Anti-Japanese War, under the leadership of the banner of the Chinese Communist Party's Anti-Japanese National United Front, the majority of young children actively participated in the Anti-Japanese and National Salvation Movement. They were extremely brave and enthusiastic in the national crisis and did their duty of fighting against Japan and saving the country, issued the light of the times, and become an important force in the National War of resistance. As a member of the nation, young children's patriotic belief of "the world rises and falls, every man is responsible" not only inspired adults, but also played an important role in inspiring the national resistance to the enemies. It also had a positive impact on the historical process of the Chinese revolution. The Children's theatre troupe, which was praised as "the three biggest stars in the Chinese children's circle", shouldered the missions of revolution, propaganda and education, not only making important contributions to the political propaganda of the Anti-Japanese War, but also promoting the development of children's drama activities and the national drama prosperity in the wartime capital Chongqing and the whole country at that time. The flexible and diverse forms of propaganda and the rich and diverse contents of the performance of the children's troupe are of strong contemporaneity and reality, making it not only a unique new force in the Second Sino-Japanese War, but also an indispensable part of the CPC's revolutionary propaganda and the National Anti-Japanese War. And it still has certain enlightening significance nowadays.

**Key words:** the War of Resistance; children's theater; propaganda

---

■ 收稿日期: 2021-05-15

■ 作者单位: 付冬生, 重庆师范大学文学院、重庆抗战文史研究基地; 重庆 400047

■ 责任编辑: 刘金波